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

主编 陈 来

张岱年 选集

ZHANGDAINIANXUANJI

李存山 / 编



中国哲学的阐释
西方哲学的透视
哲学体系的创建
20世纪中国哲学大师
20世纪中国哲学经典之作
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标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岱年选集

李存山 / 编

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哲学门经典文萃.张岱年选集/陈来主编.张岱年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06-04679-7

I.北… II.①陈… ②张… III.张岱年(1909~2004)—哲学思想

IV.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65 号

张岱年选集

著 者:张岱年

编 者:李存山

策划编辑:徐家康

责任编辑:崔 凯

封面设计:沈 赫

责任校对:校 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6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70mm 1/16

印 张:34.5 字 数:56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79-7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 000 册

定 价: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北京大学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以后，更成为全国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的中心，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以后，本设有经学、诸子学、理学等传统哲学课程，但未立“哲学”之名。1912 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学科设置改革，乃明确建立文科“哲学门”，至 1919 年，哲学门改称“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大学所建立的第一个哲学系，自北大哲学门 1914 年正式招生，至 2004 年，北大哲学系的建系历史已经走过整整 90 年。

20 世纪中国的哲学教育与哲学研究的发展，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北大哲学门建立以来，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唐钺、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冯定、陈康、贺麟、洪谦、朱谦之、张岱年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可以说，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关，而他们当之无愧地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界所拥有的自己的大师。这些大师中的任何一位，若在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可以成为这一大学足以为傲的光环；而北京大学哲学系曾拥有如此众多的大师，也就使北大哲学系拥有了其他大学难以相比的得天独厚的资源。正是这些大师们，使得 20 世纪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对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大哲学系 90 年的发展史即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史的缩影。

北大哲学系的这种地位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初年从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使得它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抗战期间，北大与清华、南开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1952 年院系调整，把当时全国大学的哲学系都集中在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1956 年以后，北大哲学系不断调出教师，或接受进修，积

极参与了各地大学哲学系或哲学专业的重建或新建，以及哲学研究所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成了全国各大学哲学系教师队伍和哲学专业人员的重要培养来源。这一切使得这些哲学教育与学术的单位，在哲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上，不同程度地以北大哲学系为楷模，受到北大哲学系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在上述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北大哲学系由于不断吸收清华大学哲学系和来自全国其他哲学系的营养，丰富和壮大了自己的发展，培养起了哲学学科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风气和心态。在研究方法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大哲学系在胡适、汤用彤的影响下，形成了重视哲学史研究的风气和传统，而清华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发展中，以冯友兰、金岳霖为代表，渐渐形成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的哲学传统。在哲学体系上，北大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心学”关系密切，而清华的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理学”接近。经过西南联大的合作和院系调整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北大哲学系，融合了不同的学术追求，兼重思想资料和哲学分析，在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上，基础更加宽厚，力量更加充实，研究更为多样。当然，今天北大哲学系的传统，不仅仅是融合了来自其他大学的传统和优长，其自身也历经了种种的发展。如1949年以后，与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洗礼，在理论素养和研究品质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从而，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和理解，结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获得了以前不可能有的成绩，在各个学科方向上也丰富了自身研究的传统。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密切联系，除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地位、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变迁、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不断融合等历史的和外在的因素之外，也揭示出现代哲学的发展与大学建制的牢固结缘。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中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

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其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大哲学系时期完成的。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关系，从一个方面标志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时代的分野，同时也不能不对哲学发展的本身造成影响。

本系列收入了十位 20 世纪曾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中国哲学家的研究著作，即胡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朱谦之、贺麟、洪谦、张岱年。这些哲学家的著述，如果参照 50 多年前贺麟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格局，在内容主体上可分为三类，即中国哲学的阐述，西方哲学的介绍和哲学体系的创立。这十位哲学家大都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虽未建立明确的哲学系统，但其对哲学史的研究亦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态度和哲学立场。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的著述，或具有对中国哲学的精湛研究，或具有对外国哲学的透彻了解，或建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哲学体系，都在哲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堪称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这些现代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哲学史的研究，还是哲学体系的建立，在 20 世纪世界哲学的相应领域中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平。回顾这些 20 世纪哲学经典之成就的取得，有两点十分突出：第一，现代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无不以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历史为参照的背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者自不必说，即使最具传统特色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他们的哲学问题意识也都受到西方哲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属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西方哲学已经成为现代哲学学科的基础，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而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世界其他哲学，将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第二，现代中国的哲学体系的创制必须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建立积极的关连。正如陈寅恪所说，“窃

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果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熊十力的新易学、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新实在论、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地与中国古典哲学相接应，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实际相结合，20世纪在构建哲学体系上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家皆是如此。

本系列的编辑，缘起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策划，而委托我来加以组织。今年2004年是北大哲学门成立90周年，精选北大哲学系的著名哲学家的重要作品并编辑为系列，不仅可以作为对北大哲学门90周年的纪念，也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成就的总结展示，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亦可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我接受这一工作后，根据出版社先编辑中西哲学部分的意见，即选定十位已故的曾任教北大哲学系的哲学家，邀请了专门研究这些哲学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他们是：胡军教授、李存山教授、张学智教授、景海峰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孙尚扬教授、黄夏年教授、韩林合教授等。他们对所编的哲学家及其著作，素有专深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共同努力，使得“北大哲学门经典系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辑完成了。对他们的大力协助和有效工作，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系列的编选尽量以突出其哲学思想为主，名著和名篇并重。编选力图与已有选集有所不同，体现出编者独到的选读眼光和安排构思，从而使得本系列在突显这些学者对20世纪中国哲学创作与研究贡献的同时，亦以提供本系列编者的独到解读为特色。

本系列的编辑还得到了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计划的支持，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 来

2004年12月20日

前言

张岱年先生（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省献县人。1928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年毕业后受聘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助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先生因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在北平蛰居读书，1943年任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次年改任副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返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51年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1957年至1977年，他受到错误的政治打击和不公正对待。自1978年起，他以耄耋之年，焕发学术青春，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81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首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他被推为会长，并经选举连任三届会长，后任名誉会长。他还先后担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多项职务。

张先生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就曾发表《评韩》和《关于列子》的文章。他从小养成沉思的习惯，具有哲人的素质。他曾回忆说：“吾昔少时，有如汉代扬雄‘默而好深湛之思’，拟穷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又曾说，他的好沉思，有如庄子所讥“无思虑之变（辨）则不乐”。在张先生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其思想创获可谓广博而又专精，丰富而又深邃。就主要的治学领域而言，他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三个方面。^① 张先生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相互发明，有机联系，皆贯穿着“综合创新”的学术宗旨。

《北大哲学门——张岱年卷》即按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研究三个部分来选编，各部分的内容则以写作或发表的时间为序。这种编排的好处是把张先生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国学大师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更集中地展示给读者。由于篇幅所限，本选集只收入张先生在各

^① 张先生自谓：“自30年代以来，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二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页。

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论文，而其专著，除了《天人五论》之外，其余只能收入最精要的部分，有些专著如《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则未能收入。为使读者对张先生的一生及其主要学术成果有一综合的认识，我在此略述张先生学术生涯的几个主要阶段。

1931年至1937年，这是张先生的第一个学术高峰时期。

1931年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此文受到冯友兰先生和罗根泽先生的高度评价。^①而在此文的最后，张先生说：“我自己在二年前对于考证发生过兴趣，现在却久已离考证国土了，并已离开古书世界了。”^②这说明在1929年后，他主要关注的是现代的哲学理论问题。当时，他在其兄长张申府先生的引导下，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尤其是新实在论者如罗素、穆尔、博若德、怀特海等人）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的著作。在1932和1933年，他发表多篇哲学论文，如《破“唯我论”》、《知识论与客观方法》、《辩证法与生活》、《哲学的前途》、《谭“理”》、《论外界的实在》、《关于新唯物论》等等。在《哲学的前途》一文中，他说：“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但我相信，将来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中心。”“这为将来世界哲学之重心或中心的哲学”当有三个特点：一、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二、辩证的或反综合的；三、批评的或解析的。^③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他说：“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对较，然后乃可见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这说明张先生当时已经经过比较和深入的思考，确立了学宗辩证唯物论的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以“宇宙为一发展历程”、“一切皆在变动，而变中有常”、“一本多级之

① 冯友兰先生说，他在报刊上“偶见此文，署名季同，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见《张岱年文集》冯友兰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罗根泽先生在将此文收入《古史辨》第四册时，在文后特加“附跋”：“在我见到的讨论老子及《老子》书的论文，与我见解同点最多者为张季同先生此文，他说老子的年代在孔墨之后、孟庄之前，是我极表同意的。”而张先生在此文之后的“附识”中却说：“我那篇稿子发表不久，我就感到有不少毛病：我本以严密为理想，但那篇文却多‘隙’‘缝’……重印那篇文，实深令我自愧。”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页。此亦可见当时张先生对考证之严谨的追求。

②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8页。

③ 凡出自本选集已收入论著的引述，在此不另注出处，下同。

论”等创造性地诠释新唯物论的精旨，又指出：

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

要之，新唯物论如欲进展，必经一番正名析词之工作。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必结为一，方能两益。

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

据此可以说，张先生关于“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思想，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就已经初步形成了。

在1932和1933年，张先生还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和《颜李之学》等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文章。前两文可谓最早的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文章。在《颜李之学》的最后，张先生说：“探索了颜李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更觉得唯物论是应信取的呢？而且……我们是应在生活上有所实践呢，还是仍觉得只诵读空谈就可以了呢？”^①由此可见，张先生当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聚焦于哲学理论和生活实践的。

1933年秋，张先生在北师大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的推荐，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在此后又发表了《中国知论大要》、《中国哲学中之非本体派》、《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逻辑解析》、《道德之“变”与“常”》、《中国思想源流》等文章。在《中国思想源流》中，他说：

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哲

^①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80页。

学上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①

由此可见，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不是“新儒学”。他的学术方向是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而“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可信的、有力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新唯物论。

1935年，张先生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将哲学的发展创新与“民族复兴，文化再生”联系在一起，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首先“必须是综合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洋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其次，它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复次，“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更次，它“必与科学相应不违”。为满足这四个条件，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上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辩证）的和批评（解析）的。

1936年，张先生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并且从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人生论四个方面提出了“新的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这里所说的“唯物”，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又是指继承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哲学中横渠（张载）、船山（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唯气论”。张先生认为，唯物与理想的综合是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之“根本倾向”的，而唯物、理想与解析的综合则是要吸收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使新唯物论的理论形态更加“精确”。他说，这个新的综合的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唯物论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此文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表述。

在30年代中期，孙道升曾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其中提到新唯物论分为不同的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

^① 《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

代表。”^①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发表后，苏渊雷先生于1936年秋写给张先生的信中说：“尊论谓以新唯物论为本，先求唯物与理想二义之综合，而兼综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切问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谈也。”^②

1935年至1937年，张先生还写成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即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此书是选出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而叙述其源流发展，可以看作是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此书所最注重的方法有四点，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其内容则包括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大部分。它是张先生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成果。此书与张先生提出的“新哲学之纲领”，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史与论同出、古与今并见的杰作，是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相互结合起来的典范。

《中国哲学大纲》写成后，经冯友兰先生和张荫麟先生审阅而推荐给商务印书馆，但因抗战爆发而未及印行；1943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将此书印成讲义；1948年，商务印书馆要将此书付印，但因战事紧张而第二次受阻；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而张先生此时被打成“右派”，作者不得不改属“宇同”；1974年，日本出版这部书的日文译本；直到1982年，署名“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哲学史名著的出版过程，几乎是张先生一生坎坷而自强不息的一个缩影。曹聚仁先生在60年代读到此书时，对“宇同”的生平和其他著作“毫无所知”，但他同意一位英国学者的看法，“宇同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其成就不在冯友兰之下”。^③

关于文化研究，张先生在1933年发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陶希圣等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起思想文化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大讨论。张先生在此讨论中发表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两篇文章。他运用辩证法，揭示“文化之实相”，既有见于文化之“整”（系统性），亦有见于文化之“分”（要素的可析取性）；既有见于文化之“变”（变革的

① 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局1936年版，第402-403页。

② 苏渊雷：《中国思想文化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③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1页。

阶段性)，亦有见于文化之“常”（发展的连续性）；既有见于文化之“异”（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亦有见于文化之“同”（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他针对当时的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两种偏颇，指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在抉择东西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综合”，“文化创造主义之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的创成”。

1938年至1948年，是张先生对“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的时期。

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附识三”中，张先生说，“新哲学之纲领，只是极其简略的粗枝大叶而已，未予论证，实则论证是很重要的”。他当时拟把1931年至1935年间写的一部分研思札记（题为《人与世界》，又名《宇宙观与人生观》）发表，以作为对新哲学之纲领的“稍详的阐述”。但是，这一计划因抗日战火迫在眉睫而未能实现。抗战爆发后，张先生留滞北平，蛰居读书，又写了较大数量的研思札记。在这两部分研思札记的基础上，他于1942年开始撰写其哲学专著《天人新论》，至1944年写成四部论稿，即《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

《哲学思维论》是《天人新论》的方法论部分，讨论哲学的职分、命题、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辩证法与演绎归纳的关系等等，贯彻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相容互补的思想。

《知实论》是《天人新论》的知识论部分的上篇，讨论知识与实在的关系，通过对感觉经验、实践经验的分析来证明客观世界的实在性，重点阐发了“离识有境”和外界实在的可知性。在《知实论》之后原拟写知识论部分的下篇即《真知论》，讨论经验与理性、知与行的关系和真知标准等问题，但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未能完成，部分思想存于“研思札记之二”（题为《认识、实在、理想》）中。

《事理论》是《天人新论》的宇宙论部分的上篇，对“实有”、“事”、“物”、“理”、“性”等范畴以及延续与变化、可能与必然、矛盾与和谐等关系作了详细的解说，重点阐发了事与理俱属实有而“理在事中”的思想。张先生在此论的“自序”中说：

民初以来，时贤论学，于绍述西哲之余亦兼明中国往旨

……学人之中，述颜戴之指者，宗陆王之说者，绍程朱之统者，皆已有人。而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

这段话亦可说是对张先生哲学思想之主要特色的一个说明。《事理论》之后原拟写宇宙论部分的下篇即《心物论》，讨论事物、理与心的关系，此论在当时也未能完成，“研思札记之二”存其部分思想。

《品德论》写于1944年，当时“物价昂腾”，张先生的生活境况十分艰苦，《天人新论》的人生论部分不能从容写成，遂以简纲体裁写成《品德论》四章，一“悬衡”（价值与当然），二“诤人”（生存与理想），三“辨命”（自由与必然），四“序德”（人群与道德），主要讨论价值观与道德理想问题，重点阐发了“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的人生之道（即充实人的内在生命力，克服生活中的乖违、矛盾，以达到和谐的道德理想境界）。

抗战胜利后，张先生重返清华大学任教，因课务繁忙和时局动荡，“新论”之作难以续成，故将已成的四论略加修订，期望单独成书，并在1948年将“新论”的主要思想归纳概括，写成《天人简论》，集中表述为“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十大命题。

《天人简论》与此前所成的四论合称为“天人五论”。此五论对30年代提出的“新哲学之纲领”进行了充实论证，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主要结集。遗憾的是，由于国难当头，生活窘迫，“新哲学”的完整著作形态——《天人新论》的写作计划没有最终完成，而已成的五论也没有及时出版，迟至1988年才在齐鲁书社出版的《真与善的探索》中面世。

1949年至1957年，是张先生由哲学理论研究转为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时期。

建国初年，张先生曾热情宣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曾撰写了几篇哲学论文，但没有能在报刊上发表。张先生在30年代曾批评对新唯物论的“墨守”态度，所谓“墨守”就是“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而他认为“学术之

进，端赖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水，实非真学”。至 50 年代，“墨守”的态度已成为学术风气和政治禁锢，加之 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先生调入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由于教学分工和当时学术研究的环境所限，张先生开始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研，而把 40 年代写的哲学论稿收入箱笥之中，对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了。

1954 年至 1957 年，张先生发表了《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张横渠的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和《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等论文，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专著，还为教学所需而编写了《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此时期张先生更多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并将其用之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而其大体风格则是《中国哲学大纲》的延续和发展。不幸的是，张先生在 1957 年因言罹祸，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由此沉寂 20 年，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

1978 年以后，是张先生焕发学术青春，进入第二个学术高峰的时期。

张先生在晚年重登讲席，为研究生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课程，亲自指导、培养了十多名硕士和博士，而受其教诲、奖掖和提携的学人则遍布学坛。他在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期间，殚精竭虑，引领后学，为推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 80—90 年代的文化大讨论中，他以其“学界泰斗”的地位和他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精深研究，为正确评价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方向，反驳和澄清对传统文化的种种错误认识，发挥了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作用。^①

1978 年以后，张先生已入古稀之年，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他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和哲学理论的论文，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

^① 陈来教授指出：“张先生并不赞成‘儒学复兴论’，他自己明确表示他不是‘新儒家’，他一贯明白指出儒学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在 80—90 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在促进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优点和现代意义方面，在反驳和澄清有关儒学认识的种种错误观点方面，张先生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见《张岱年先生的儒学观》，《中国哲学史》2004 年第 3 期。

料学》、《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和《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专著。1989年至1994年，清华大学陆续出版《张岱年文集》六卷本，其中后两卷一百多万字为张先生在1978年至1989年的主要论著；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岱年全集》八卷本，后两卷主要是他1989年以后的论著。除此之外，张先生还与他的学生合著了《中华的智慧》、《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文化传统简论》，主编了《中国唯物论史》等等。在古稀之年以后，还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造力，写出数百万字的高水平论著，这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我认为，张先生在30年代他二十多岁时，构建“新的综合哲学”思想体系，写出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提出“创造的综合”的文化发展方向，亦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张先生在《八十自述》的回忆录中说：“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①由此可见，张先生晚年想在哲学理论方面更有创新。他在80、90年代发表的《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论价值的层次》、《论价值与价值观》等论文即体现了他晚年的哲学探索。1993年，张先生写了《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他在文中说：

我在30年代至40年代思考了一些哲学理论问题，写过一些论著；50年代之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讨，光阴迅速，匆匆几十年过去了，但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

我经常考虑的理论问题是：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事理关系（共相与具体事物的关系）问题，心物（精神与物质）问题，生命在宇宙中的意义问题，知识来源问题，真知标准问题，生命与道德理想问题，个人与社会问题，人生最高理想问题等等。

他把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十大命题，即（1）物我同实；（2）物统事理；（3）一本多级；（4）物体心用；（5）思成于积；（6）真知三表；（7）充生达理；（8）本至有辨；（9）群己一体；（10）兼

^① 《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6页。

和为上。他指出：

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在理论上是唯物的，在方法上兼综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这些观点，总起来看，既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又昂扬人的主体自觉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于改变客体，而改变客体必然有一定的目标，也就是必然依照一定的准则。这一定的准则即是人生理想，人生理想的核心是“当然”的自觉，亦即道德的自觉。道德的自觉也不是纯粹主观的，而必然参照客观世界的实际，这是我的基本认识。

可以说张先生在哲学理论上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客观世界与道德理想”问题，此问题实即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问题。康德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区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而张先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则是主张“一本多级”或“物本心至”，此即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所说：“能知‘本’与‘至’的分别，则综合唯物与理想，无难。”

张先生的哲学思想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学宗辩证唯物论，采西方哲学之精华，而其根柢深扎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其哲学理论以此为基础，而且他晚年对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推阐也大多以中哲史研究的形式出之。”他在中哲史研究领域的著述广博精深，创获实难于细举。如果大而言之，张先生所注重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系统和基本特点的探索；
2.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疏释；
3. 表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和辩证法思想；
4.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价值论思想的研究；
5. 对于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梳理和方法论的探索。

受篇幅所限，在此不对这几个方面作展开论述，读者可参看我写的《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述要》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①

张先生在文化研究方面，自30年代参加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大讨

^① 前文载《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6期，后文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